

中国近代 Z HONGGUO JINDAI
ZICHANJIEJI ZHENGDANG
XIUESHUO YANJIU
资产阶级政党学说
研究

杨德山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 / 杨德山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

ISBN 7-01-003670-5

. 中... . 杨... . 资产阶级政党 - 理论研究 - 中国 - 近代
. D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6151号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

ZHONGGUO JINDAI ZICHANJIEJI ZHENGDANG
XUESHUO YANJIU

杨德山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网址：<http://01.peoplespace.net>

E-mail: 01@peoplespace.net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9.625

字数：236千字 印数：1-2,000册

ISBN 7-01-003670-5/D·1016 定价：18.00元

序

对现代汉语而言，“政党”是一个外来词汇。在我所查阅的中国古籍中，并没有将“政”和“党”联在一起使用而叫做“政党”的专有名词。古汉语中的“党”大致有三层含义：其一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社区组织的区划名称，如《周礼》所云：“五族为党，五党为州。”有时也作邻里亲戚关系讲，如“乡党”。其二是与“群”相对的人群集合体，如《论语》中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三做“阿比不公”解，如《周书》有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朋党”、“私党”即由此引申而来。这些都与近代政党的含义没有什么关系。

近代政党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其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就之一，也是资产阶级间接民主制度得以实现的标志和保证。它自身也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壮大，并不断对外拓展它的影响力的历史。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对东方古代民族的征服过程，也是东方民族觉醒、抗争，并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民族社会和国家的历程。在这个艰辛的历程中，这些民族的先觉者们借鉴西方近代政党的一些组织形式，结合本民族的某些政治文化传统，创建了不少革命或改良政党，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专制压迫，

求得民众自由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60年，是中国逐步堕入半殖民地，走向半资本主义社会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振兴而上下内外求索。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合群”救亡的声浪中，以革命共和为宗旨的兴中会和以维新立宪为追求的强学会应运而生。在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这两种主张的政治团体各自以“会”、“社”等名义发展成为形形色色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组织。这些政党进行的政治活动、内部的派系分合、彼此之间的争执冲突，构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推动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进程。

应当说，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中国近代政党的演变发展、组织活动状况进行研究的著述不在少数。但是，从学理层面对其进行整体性探讨的成果则并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里政治学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纵使在政治学恢复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它的发展道路也颇不平坦，所以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政党学的理论研究状况更谈不上有多少建树。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研究工作尚待深入。这一工作至少能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人们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各种政党为什么会这样组织、这样活动等基本问题一个初步的回答。杨德山同志这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研究》著述所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我读完这部著述之后，感到它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部著述自始至终坚持和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及方法。作者在介绍、说明中国近代政党学说发展的每一阶段的情况时，都对它们产生、形成的社会和政治历史背景作了客观的分析，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这就使得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

党学说所体现出来的阶段性特色不但有了史料依据，而且有了史实根据，史论结合得比较完善。非但如此，作者在著述的整体和每个具体问题分析说明的谋篇布局上，也很好地反映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发展过程中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

其次，作者分析问题的视野比较开阔。他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发展，放置在近代群体观和政治思想的演变背景下叙述，视点较高较宽。在对文献资料进行说明和分析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材料的简单介绍和梳理上，而是从文献的内容出发，将它们同与此相关的西方政党学说进行反复比较，找出其异同点，反映其特色。作者还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许多具体内容，从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近代欧美政治学说等方面作了学理上的溯源考察，使整个著述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感。

再次，这是一部以文献分析为主要内容的著述。作者在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涉猎了有关原始文献，资料准备充分，所以结论言之有据。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资料都是第一次被使用。而且作者还对目前有些相关作品中引用资料不确当的地方作了更正说明。这反映出作者比较严谨的学风。

第四，作者在文字表达上基本上做到了明确、精练、完整、活泼。整个著述虽然引文较多，但读起来并不感到吃力。而且在节段之间，作者没有使用惯常的“开中药铺”的方法，而是利用了一些关联词，巧妙地衔接起来，使人读后有一气呵成之感。

可以这样说，这部著述是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所作的第一次整体性研究的、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作品。我也衷心地希望作者能够进一步对所涉猎的若干个案问题作更为细化的研究；希望作者有可能的话，将近代之后的非共产主义政党学说作些系统化的研究。

作为本著述作者的博士学位导师，我对这部著述的看法请读者作个公断。

林茂生

2001年11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序	林茂生 (1)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萌发	
.....	(20)
一 从群体观的演变到政党问题的提出	(21)
二 “党国”之党与“党党”之党区分初述	(28)
三 立党救亡论	(37)
四 立宪派人物略论政党	(48)
五 “革命党”的自我定位	(55)
第二章 “预备立宪”时期的政党理论	(69)
一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70)
二 立宪派的组团、建党活动	(76)
三 立宪派对政党内涵的认识	(83)
四 政党与宪政关系诸说	(93)
五 政党功能观之一：“国家之福神”	(101)
六 政党功能观之二：“一国人最高之导师”	(108)
七 政党功能观之三：“高尚人心”，还是做官发财	(114)
八 革命党人对政党的看法	(120)

第三章 “政党政治”时代的政党问题争论

..... (129)

一 民初政党活动景象 (130)

二 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观 (137)

三 梁启超对政党问题的见解及其他 (145)

四 政党与政体关系的理论争执 (157)

五 政党体制选择上的“一致性” (165)

六 打造中国“两党制”的几种设想 (177)

七 另类政党体制选择透视 (185)

第四章 中国近代的“不党主义”思潮..... (196)

一 西方近代反政党理论略述 (197)

二 袁世凯的反政党主张及活动 (206)

三 下层社会的反政党意识 (218)

四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政党立场 (226)

五 旧立宪党人的“无形政党主义” (233)

第五章 孙中山的党建、“党国”学说及其演变

..... (246)

一 新“国家主义”观的形成 (247)

二 孙中山“以人治党”的党建思想 (257)

三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党国”设想 (271)

四 蒋介石的“党治”理论略说 (280)

结 语 (294)

主要参考书目 (300)

后 记 (304)

前 言

本课题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为探讨内容，按阶段、分时期侧重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政治人物有关政党问题的学说、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和演变情况进行说明和分析。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对下列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和 本课题选题的目的意义

中国近代政党以其数目繁多、关系复杂、争斗激烈而一向为史学界关注。民国建立不久就有这方面的著述问世，如古研氏著的《中国秘密会党记》（《东方杂志》第八卷第十号）等。谢彬编著的《民国政党史》（上海：学术研究会总会，1924年）正式开启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先河。印维廉编辑的《中国政党史》（上海：中央图书局，1927年）、杨幼炯著的《中国政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以及北平建国报社1945年10月出版的《中国政党史》均以国民党（自兴中会至中国国民党）的奋斗史为主线，介绍和叙述了中国近代政党的发展、演变情况。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一些学者在继续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同时，也开始关注近现代政党史的研究工作。20世纪70年代

未开始，学者们有关近代政党问题的研究探讨著述在整个近代史研究的作品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其中，宋春、朱建华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党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中国政党词典》（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和邱钱牧主编的《中国政党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是这些著述中的代表作。此外，我国台湾学者张玉法在70年代也推出了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力作《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等。

所有的这些著述，抛开作者们的政治价值取向不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均以描述为主要手段，或简或繁地说明了近代以来各个政党产生、发展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情况，并对这些情况产生的原因作了分析。这为本课题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至少是知识性的帮助。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政党的研究正朝着纵深向度发展。其表现一是对近代政党制度或体制的演变作了说明和分析，如朱汉国著的《中国政党制度史》（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等；二是为数不多的一些学者对中国近代的政党观，尤其是革命民主派的政党理论进行了探索，如萧铁肩著的《历史脚步一伴音——孙中山政党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这些研究动态给本课题的研究以很大的启发。

本课题要探讨的是中国近代政党学说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状况。之所以选择这个问题做研究对象，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关于中国近代各政党组织的产生、发展以及相互关系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不在少数，但为什么它们会这样，而不是那样产生、活动，彼此之间会发生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关系？究其原因，除了它

们的理想信念不同外，还与它们的创建者们对自己所创立组织的发生原因、性质、功能和如何实现这些功能等问题的认识有关。这些认识构成了他们各自的政党观念和学说，它们是整个中国近代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近代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整体研究尚未展开。二是不可否认，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从整体和个体角度研究政党学说的论文，但是，就整体研究而言，从政党学说本身的逻辑体系出发，依据历史资料得出结论的成果并不多；就个体研究而言，一些论者的分析并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政党学说自身认识框架的基础上，所以得出的结论有强前人所难之嫌。而且在中国近代政党学说的研究中，无论是个体研究，还是整体研究，学界对维新立宪派及其主要人物的政党学说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

本课题准备以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历史资料出发，按照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整体上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学说作说明和介绍，并将它放置在中外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分析其学理渊源和基本特征，揭示其发展趋势。以期在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认识方面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政党问题概说

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末的英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底，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大约四千个政党组织。在这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有关政党问题的述说、研究文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要对政党的概念作一个完整准确而又能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解释实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在这不算太短的时间内，政党自身就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体现

出了纷繁复杂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各个民族国家和自治区域，由于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又使它们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区域性特色。还是让我们沿着历史发展的线路，看看政党在不同的时期所表现出的特性，以及当时的人们是怎样认识和研究它们的吧。兴许，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1679年5月，英国议会就信仰天主教的詹姆士公爵王位继承资格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部分议员提出了剥夺詹姆士王位继承权的《排斥法案》。以沙夫茨伯里为首的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反政府派议员对该法案坚决拥护；而以丹比为核心的反映王室和旧贵族愿望的政府派议员对此则持反对立场。彼此之间攻击谩骂，拥护者指责反对者是“Tory”（“托利”，意为“爱尔兰歹徒”）；反对者责骂拥护者为“Whig”（“辉格”，意为“苏格兰盗马贼”），英国议会内的派别之争由此拉开序幕。1688年，辉格派议员联合部分托利派议员组织和发动了“光荣革命”。1689年及1701年，议会相继通过了《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法》，确立了“议会至上”、“议会主权”原则，议会成了英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此，议会中的两大派别开始轮流执掌国家权柄。这是英国，也是世界政党现象和政党政治的发端。

英国议会内的党派之争起初并没有引起政治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大众的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抱怨之声渐起，人们视派别之争与民族利益相对立。1770年，时任罗金汉派辉格党主要发言人的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推出了《关于目前不满情绪的根源》（Thoughts on the Cause of the Present Discontent）一书，对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必要性，甚至基本运作方式作了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他认为，“政党是人们为通过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并根据某种他们认同的原则而结成的组织”。这一

规范性、理想化的定义式说明成了日后那些追求政党政治的人们宣扬政党合法、合理性的依据。

相对于英国的情形，美国政党出现时境遇就不那么幸运了。美国建国之后，在国家结构形式和民众的权利自由保障方面，开国元勋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 1757—1804）等人极力主张中央集权制，对人民的权利加以限制，人称“联邦党人”；而以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为首的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地方分权制，并要求将人民的权利用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人谓“共和党人”。两派之间由政见之争发展到后来的意气之斗，我是彼非，非白即黑。前者称后者为“反联邦党人”，后者回敬前者“反共和党人”。

两派之间的争斗令总统华盛顿及其他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曾先后与两派领袖都有过政治合作关系的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认为，所谓政党是“一部分公民因为有着共同的利益、欲望、情感而结合起来的团体，它的存在妨碍了其他公民权利的实现，甚至会危害社会整体、长期、共同的利益”。麦迪逊的这一看法及同一时期美国其他对政党存在抱有反对态度的人们的观点成了后来“反政党主义”者持论的佐证。

然而，不管柏克如何肯定政党存在的必要性，也无论麦迪逊们怎样厌恶它的出现，政党却实实在在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发展到了至今，而且短时期内还看不到它有灭亡的迹象。不过，对上述英美国早期产生的这类党派，政党学专家们并不以为然，称之为“political faction”（派系、派别。日文旧译为“徒黨”，汉语旧译为“私党”、“朋党”）。因为较之后来的政党，这类集团既无明确的政治纲领，常常只是以某个政治领袖的倾向为政治导向，又无一定的组织系统，以及与之相应的规范体制，活动的范围也仅仅限于国家权力

中枢之内，而且它们的功能主要只是表现在执掌政权和一定程度的权力体制内部的监督上。所以他们认为，真正的政党是在19世纪上半叶才出现的。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世纪末，源于英伦三岛并迅速影响欧洲和北美大陆的“产业革命”掀开了人类发展历史的新的一页。新型的工厂代替了旧式的手工作坊，蒸汽机的发明和采用使得劳动生产率发生了质的飞跃。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农业人口锐减，都市居民激增，整个社会阶级、阶层划分日趋简单化。新兴的工商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的政治参与意识愈益强烈，传统的代议民主体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改革选举制度，扩大参与范围，成了19世纪上半叶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与此同时，政党的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功能形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就组织形式而言，比较健全的政党都依据国家行政层级的划分，由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级组织机构；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内部也设置了彼此联系密切的各种职能部门，领导、指导、协调全党的活动；党内的人事管理都有一套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原则系统和纪律规范。以活动内容而论，制定方针政策、争取选民支持、扩大本党势力、获得多数选票、谋取本党执政是它们的追求目标。与此相应，政党的功能形态也由过去的执掌政权和一定程度的权力体制内部监督，扩大到对选民利益的表达与集约、对社会政治环境的调节和稳定、对选举活动的组织及操纵、向国家权力系统培养和输送政治精英，甚至对大众进行政治社会化宣教等等。活动范围也由权力中枢走向大众社会。政党逐渐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力量。在此之前的国家权力运作流程——“国家元首→官僚机构→公民社会”变为“国家元首■官僚机构■政治中介（政党和社团）■

公民社会”。真正的政党（political party）和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由此正式形成。

这类政党不但包括了由原来被称之为“派别”而演变过来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还包括了基本认同现存政权体系，并竭力参与其中，试图利用它为本阶级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组织，如被列宁称之为“工人阶级第一个政党”的英国宪章派（1840年成立的“全国宪章协会”）。当代政党学专家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将前者称之为“内生的党”（The Electoral and Parliamentary Origin of Parties），后者称之为“外生的党”（Extra-Parliamentary Origins of Parties）。

整个19世纪可以说是政党空前繁荣发展的历史阶段，政治学者也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对政党的认识和研究领域。人们通常将代议制、选举制与政党政治联系在一起考察，认为“政党就是在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类似组织所进行的竞选中赢得公职的组织”。是“政治家们之游戏而已，攫取利益之手段而已”。较之柏克对政党概念理想化的说明，这种解释更具实证性，而且更能反映出人们对这一阶段政党垄断政治资源，贪污腐败公开化现象所存有的普遍厌恶，而又不得不接受它存在的矛盾心理。

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末的共产主义政党也是一种“外生的党”，它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建立产业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人人平等，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为帜志。在马克思时代，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对现存的资产阶级政党及工人阶级内部的改良主义政党均持否定态度，他们强调共产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原则，并且认为政党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取得现政权的工具而已，一旦目的达到，共产主义的政党也会自行消亡。到了列宁时期，共产主义的领袖们

除了继续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先进性原则外，特别关注党的组织纪律建设（“铁”的纪律），关注对党员自身政治素质、政治战斗力的培养（是“特殊性格”、“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及至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列主义上述建党思想的同时，突出了对党员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建设的要求（做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共产主义者对政党的总体看法是“政党是一种社会，是一种政治的社会。政治社会的第一类就是党派。党是阶级的组织”。这种认识既是历史的，更是科学的。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早年，生活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人们，随着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及民族工商业的产生和壮大，在同外来侵略者及本土专制主义势力的斗争中，也组织起了自己的政党。它也是一种“外生的党”，其使命基本上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二是使本民族走上政治和社会近代化道路。“党之用意岂有他哉？不过保一国之主权而已。”“是故专制者，党派之母也。有专制然后有党派，有党派即以倾专制，相生而相克，功用良不诬矣。”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拉帕隆巴拉（Joseph La Palombara 1925—）和韦纳（Myron Weiner 1931—）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art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书问世之前，这类政党组织并没有被纳入西方政治学者研究的领域。中国近代的政党、政团组织就属于这种类型的政党，当然它们有着自己本土化的特色。

从上述政党发生、发展状况，以及人们对政党的认识研究情况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党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生活中，围绕政治共同体（国家或地区）的公共权力而展开活动的相对稳定（有目标、纲领、纪律、组织）的团体。它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某种特定

的环境中，它又是民族和政治危机的产物。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界定

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有“党”，甚至有“党政”之谓，无所谓“政党”。“党”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上，通常有三层含义：朝廷官员之间的派系现象，此称“朋党”；明清之际下层社会的造反组织，此谓“会党”；有些皇朝在基层社会设立的社区行政层级，如“邻”、“里”、“党”之“党”。汉语中的“政党”是19世纪70时代从日文的“政黨”形译而来的。而日文的“政黨”又是由德文的“partei”意译而成的。

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早期改良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就开始关注西方近代的政党政治现象。然而，近代中国人从实际应用角度认识政党问题，并组建自己的政党性质的团体却是1894年之后的事情。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在一片“合群以救亡”声中，上层社会以旧式“学会”为参照模式，组织了以自由思想启蒙，爱国救亡图存为主要宗旨的新式政治改良团体（如强学会），并在此后不久掀起了近代史上影响至深的戊戌变法运动。与此同时，中下层社会借鉴历史上的“会党”组织，利用种族仇情，导入民主共和理念，成立了暴力革命组织（如兴中会），在华南沿海一带发动了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暴动。1900年，西方列强为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扩大对华侵略，组成八国联军，直接侵犯天津、北京、河北地区。沙俄还乘机占领东三省。次年9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这标志着中国由此完全陷入到了半殖民地的深渊。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激发了人们爱国热情的空前高涨。由留日青年学生组成的爱国救亡